

#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吴 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关键词]**直隶士绅;构成;特点;心态

**[中图分类号]** K25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0)04-0019-04

直隶是清王朝北方最重要的省份,当时范围相当于今河北省绝大部分、京津两市全部及河南、山东、辽宁和内蒙古的一小部分。直隶地处清王朝统治中心,传统政治力量强大。士绅作为清代一个特殊的阶层,地方势力的代表,它不仅享有国家赋予的各种特权,而且支配着民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蓬勃兴起,并在此形成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其间与直隶士绅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 一、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

关于直隶士绅的构成,笔者在“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一文中已作界定,<sup>[1](P121)</sup>在此不再赘述。那么,在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为什么会有很多直隶士绅参与其中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义和团在政治、经济上的行动基本反映了士绅的要求和愿望

义和团运动在政治上的宗旨主要体现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上,这既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壮大的要求,也符合了当时士庶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仇外心理。“夫人之所以笃信团匪,日以其能扶清也,以其能灭洋也。”<sup>[2](P211)</sup>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这一口号对于团结士绅起了积极作用,就连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劳乃宣也说,义和团“以扶中朝灭洋教为词,声言为国家出力,非特托名于义,抑且托名于忠。故与教民有嫌隙者为其所动,与教民无嫌隙者亦为其所动,……其簧鼓众听得力全在此。”他还说:“非特愚民为其所惑,学士大夫亦所不免。”杨慕时也埋怨,“其始愚民惑之,今则贤士大夫几乎无一而不为所惑。”<sup>[3](P473,470,354)</sup>义和团的《马兰村告示》阐述得更为淋漓尽致,“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sup>[4](P148)</sup>这就把斗争的目标局限在只反洋人,不反朝廷和维护统治秩序的范围,不自觉地符合了直隶广大士绅的政治态度。尽管一些口号的提出、揭贴的创作,出自于士绅,但毕竟符合义和团乃至广大人民的意愿。当然,义和团的口号、行动,有时也表现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但这也是主流,并没有促成义和团很快走向清政府的对立面。

义和团是根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认识十分肤浅,以至持排外态度。他们在经济上没有,也不可能提出高的要求。在众多的义和团文献中,竟罕有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也没有大规模侵害士绅利益的行为。时人记载义和团民“自备资

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sup>[5](P15)</sup>这是对义和团民的真实写照,在国难当头时,他们朴素的民族感情不带一点私利,更没有向封建统治基础发起冲击的准备,这就在经济上也未触动直隶士绅的利益。

(二)义和团纪律严明,为直隶士绅起了榜样和宣传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提督梅东益在景州、任邱、新城等地大肆杀掠。一些借剿匪之名的带勇员弁也趁机“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致闾里骚然。”<sup>[6](P13)</sup>其倒行逆施无疑是厝火积薪,连上谕也认为清军“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义和团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义和团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名叫吴正斋的退休小官僚,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谈到义和团占据涿州城的事,信中说:“闻其居城一日,城内秋毫无扰害。”<sup>[7](P261)</sup>一位官吏在直隶各州县的见闻也是“不伤害行客”,“秋毫无犯”。有的记载更为生动,说团民“吃素,喝白开水,不谓一钱,不扰百姓,不沽名气。”<sup>[8](P82)</sup>清军对外畏惧厌战,对内却欺压百姓,这与义和团民的作风形成天壤之别。很多士绅对官兵非常痛恨,采取敬而远之的办法;定兴县令罗正钧在士绅的再三恳请下要求官军“移调他所”。<sup>[9](P309)</sup>

(三)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的支持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追述义和团运动初起时直隶地方官的态度时说:“直督裕公,本庸儒无意识,颇信拳匪为义民,但尚未敢极端嘉励,一辄依违持两可,以观风色。臬司廷雍,则一意徇庇,所之承奉之者,无所不至,拳民由是益骄。”<sup>[10](P17)</sup>裕禄的首鼠两端,廷雍的“一意徇庇”,也与直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天子脚下,办事不能不谨小慎微。清政府不仅在政策上施加影响,而且可直接插手直隶的事务,赵舒翘、何乃莹和刚毅等人的涿州、良乡、保定之行即说明这点。直隶地方官要在民心趋向、群众压力、秩序的维持和列强的威逼下,维持一个均衡,并不是容易的事。这种状况就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空间,当时直隶各州县大多以一纸告示空文塞责,并不实力严查。河间府如松就认为“拳匪宗旨不过仇教,并未扰乱法纪”。<sup>[11](P239-240)</sup>霸州刘牧则“凡遇拳民诬控教民,”“迅即饰差严拿教民到案,任意苛责。”<sup>[12](P28)</sup>而枣强县令早在1899年春天就允许一位义和团首领自由出入

他的衙门。<sup>[13](P69)</sup>有的材料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迅速蔓延时,除少数州县外,各州县“地方官多以义民目之”。<sup>[14](P325)</sup>这是直隶地方官在民族危机面前久不舒正气的一种反应,而士绅是与其贴得最近的一个阶层,他们对义和团的默许、支持自然成为影响直隶士绅取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 (四)义和团“神术”对直隶士绅的鼓舞

“盖洋人之炮利也,必求所以不畏炮火者;兵精也,必求所以能制其兵者;至此而民之技穷,乃有为之说者日,胜此者,非神道不为功。于是义和团之说起矣。”<sup>[15](P486)</sup>此外,“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sup>[16](P404)</sup>由于科技落后的情况下,找不到更好的武器来抵御列强入侵,更谈不上复仇雪耻。在此种失衡心态下的奋发图强,只能寄托于非现实的力量。恰逢此时,义和团“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神术犹如久旱后的甘霖,给困惑中的士绅带来了希望。因此“自士绅以致妇孺,皆拍手顿足,喜邀神祝。”<sup>[17](P29)</sup>“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女;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sup>[18](P77)</sup>这并没有夸张,美国缅因大学的斯通教授认为,“教条的或封闭的人喜欢拒绝不符合他既有信念和态度的信念。这种人还可能是僵化的并不依赖于外部权威的。”<sup>[19](P187)</sup>直隶士绅教条、封闭与排外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遇到义和团及其“神术”时,会将其奉为权威的。

### 二、义和团运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直隶士绅

在义和团运动前期和高潮时期,直隶士绅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 (一)义和团运动的组织领导者 and 参与者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大多数直隶士绅陆续地加入到义和团运动的行列中来,或作为领导者指挥一方,或作为一分子积极参与。“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于其中”。<sup>[20](P452)</sup>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普通百姓一样站到了运动的最前沿,并组织领导了一些区域性的斗争。如阜城城南临镇的赵斌、衡水县留仲的渠成江、易县的车云能、涞水县的阎洛福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为什么能成为组织领导者呢?这是因为:

第一,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组织能力。“盖向来中国仇视洋人之事,由士林主谋者十居八九;”“此次凡谋与洋人为难者非进士,即举人,非举人,即秀才。从未闻无功名之士,能煽动愚民为其效力者。”<sup>[21](P297)</sup>这些时人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对直隶的3府2州6县停考5年,这件事更证明了士绅在其中的作用。据调查,衡水、武邑、冀州、阜城等地的义和团首领大多数是由士绅充任的。<sup>[22]</sup>直隶士绅参与和组织义和团运动的行动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个人自发的组织。在盐山县树起第一面义旗的就是王信村的贡生王儒村,该人曾做过某县的教谕,因遭受洋人凌辱而弃职归里。当义和团浪潮涌来时,他首先响应,加之他在这一带素有威望,经他一带头,方圆十几里的村庄一拥而起。<sup>[23](P143)</sup>二是有组织的联合进行。保甲团练大都控制在士绅手中,他们的动向基本上反映了士绅的意志。至迟在1899年下半年,当义和团还在直隶南部地区活动时,天津一带的保甲团练已在局绅领导下有组织地、普遍地开展了反洋教斗争。是年秋,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樊国樑在给裕禄的信中说:“天津、静海、庆云各属保甲局绅串通暗约,以阻挠天主教为事,借端寻衅,扰乱欺凌,以致教民不得安生度日。……耑以致各处效尤,盖无底止。”<sup>[24](P18)</sup>当时直隶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乡保地方,率皆党类,”<sup>[25](P22)</sup>到

了义和团高潮时期,一些士绅控制的乡团更倾向于义和团。

第二,具有较好文化素养的士绅充当了揭帖、传单、起草人。义和团运动中众多的揭帖、传单、书信等多出自他们之手,其中不乏较少迷信色彩而据事说理之作,如张德成入天津时告示,曹福田致天津租界侵略军的挑战书,等等。这些揭帖、传单对于扩大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唤醒民众,使世人了解当前形势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绝大多数士绅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懂得文化宣传的重要,如武清县连各庄秀才出身的说书先生韩三庆,他演唱的段子都是自己编写,编出了不少颂扬义和团、鞭挞入侵洋人的唱段。在《打洋村》的唱词中写道:“一片狼烟白昼昏,万处悲声夜近闻,携男抱女东逃西奔,搀老扶幼叹熬人,民受倒悬苦之尽,以卵击石吾共闻,众臣宰撤官逃走一个个弃任,大清国,卖国求荣一字都是买卖臣。”后来又鼓动“众家兄弟别泄劲,不夺天津不撤军”等等。<sup>[26](P58,244)</sup>以韩三庆为代表的士绅较了解民间疾苦,其作品朴实、真诚,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容易调动起群众热烈响应的情绪,所以他们能较容易地团结民众,领导斗争。

总之,和普通群众相比,士绅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力较强;和官僚们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与民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士绅更适合于领导民众。他们在民族危机关头团结、组织民众,抵御外来侵略,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成为推动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河北省各州县中士绅出身的义和团首领是很多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资料的缺乏,今天已经很难统计齐全,现仅根据已掌握资料,将一些士绅出身的义和团著名人士列表如下,以供参考:<sup>[27]</sup>

姓名	籍贯	功名及其他	姓名	籍贯	功名及其他
郑升平	青县	武监生	左洛岑	望都县	绅士
郑蜀江	青县	举人	阎洛福	涞水县高楼村	武举
郑润江	青县	秀才	阎崇修	涞水县高楼村	秀才
李春田	武垣县	绅士	李连儒	武垣县	绅士
丁老连	武垣县前丁庄	武秀才	李费堂	武垣县前大史村	武秀才
王儒村	盐山县	贡生	车云标	易县大方村	绅士
渠成江	衡水县留仲	武举	刘信芳	易县	绅士
郭老连	衡水县留仲	秀才	王老红	衡水县留仲	武举
祁子刚	广阳县	塾师	杨锡霖	遵化县	翰林院庶吉士
赵斌	阜城城南临镇	武举	赵汝霖	阜城城南临镇	秀才
田燮经	深州	武举	胡连生	深州	武举
倪赞清	东安县齐官屯	武进士	魏福田	景州刘八庄	退籍官僚
蔡廷宾	广宗县东召村	武举	邓秉峰	朝阳县花子沟	秀才
刘永清	广宗县	秀才	李永平	廊坊边家坟	绅士
郑百川	广宗县板营	塾师	唐凤洲	廊坊芒店	教学馆先生
米书秀	阜城米家小营	秀才	张玉璐	清苑县谢庄	附生
韩三庆	武清县连各庄	秀才			

#### (二)处于中立状态的直隶士绅

义和团运动是在自发、没有统一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有一部分士绅鉴于自己的功名与地位,不敢贸然参加。他们中有的办团练自保,有的充当了团教之间的调解人。易州良冈村赵氏为西陲大姓,功名颇盛,由岁贡生赵竹轩、赵云峰等组织团练,以护村为名而护院,中立于拳教之间。<sup>[28](P38)</sup>在沧县,有的士绅为了拳教均不得罪,甚至将“英人牧教师、潘教医士暨眷属等护送赴津。”<sup>[29](P965)</sup>这类士绅的最大特点就是中立于拳教之间,以官府之是非为是非,官府叫他们去劝谕解教义和团,他们便前去效力,但又胆小怕事,对义和团一般不

敢随便得罪,往往迁就了事。给事中胡孚辰片中说:“凡两省(山东、直隶)官吏来京,多谓为邪教支流,必须剿办;而两省士绅则谓系良民自卫身家,并非谋乱,即或聚众滋事,只可设法解散,不宜轻剿。”<sup>[30](P83)</sup>因此很多士绅愿作中介人从中调解,霸州、涑水、天津等地都有士绅前去开导,劝说义和团解散。后来有些士绅出于安全考虑,办团练以自卫。《庚子西行记事》的作者唐晏在怀安文昌书院时,曾劝说讲席雁题练乡团五十名,以保卫地方,仅仅是为了壮声威,图自保而已。<sup>[31](P475)</sup>处于中立状态的士绅,到高潮时大部分也倾向义和团了。他们虽见风驶舵,但没有造成大的危害。

### (三)义和团运动的反对者

这类士绅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到高潮时期,由于清政府态度的明朗,反对义和团的士绅极少。就运动前期来看,这些反对者以不同方式对义和团进行抵制,一是进行诽谤、蛊惑。易州原知州窆以筠,寓居城内时,背后诽谤团众。荣荫书院山长高庚恩也曾公开对生员讲:“义和团之以扶清灭洋为标榜者,诱愚民而惑朝廷,此辈愚氓灭洋则不足,乱清则有余。”<sup>[32](P33,51)</sup>这类士绅的特点是以流言来对义和团进行诬蔑、中伤,造成的影响极坏。二是组织武装,公开对抗。静海县武庠生李寿庚,义和团一兴起,他就进行大肆镇压。盐山县士绅李慕皋编保甲团练与义和团公开对抗,有的士绅还招勇护城,甚至请兵助剿。三是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在天津,有的士绅看“势不能禁,不如觅凤识拳首者,暗中婉劝,……以维大局。”<sup>[33](P99)</sup>在景州的宋门,官府协同士绅们也谨慎地劝说义和拳民,让他们放弃复仇的怒火,静下心来,暂时解散。<sup>[34](P251-252)</sup>总起来说,持反对态度的士绅,在义和团运动前期和高潮时期仅居少数,在一些区域或明或暗地进行。

## 三、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士绅

1900年9月7日慈禧太后下令剿杀义和团至1902年7月景廷宾在直隶广宗一带起义失败,应视为义和团运动的后期。在此期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对义和团政策由“抚”改为“剿”,形势骤变。多数直隶士绅见势不妙,采取明哲保身,保持中立的态度,还有少数士绅仍然举起反抗的大旗,以各种方式同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进行着斗争,尤其在反对赔款问题上,态度坚决,影响深远。但是,也有少数士绅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地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联合起来大肆破坏。

### (一)上下斡旋,稳定社会秩序

这类士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居于多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高潮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参与和组织领导了义和团,但在形势不利时,偃旗息鼓,以中间人的身份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并屈从于内外压力,组织公议局等机构,多方筹措赔款,以满足帝国主义的要求。在大名,各绅士开会“发表加征赔款事”,有人以抗捐为辞到会,令绅士起反,结果“诸绅急散会而走。”<sup>[35](P955)</sup>在关键时刻,他们的所做所为阻挠了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现象,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在国破家亡,民生困顿的情况下,这些士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首先是办理善后,招抚流亡。在天津,由于局势的混乱,为防“土匪趁乱抢掠,奸细暗中放火”,士绅张少农等设立铺民局,“各处居民,亦皆轮班坐夜,以防不测。”<sup>[36](P16)</sup>“士绅李嗣香等人目睹‘读书寒士苦状’和贫民生活的困苦,乃筹银两万两,移埋死尸,办理賑济,使人民生活得以稳定。”<sup>[37](P58)</sup>在临榆和河间,一些绅董要么被派下乡劝说人民回家安业,以便开春耕种;要么查

明流亡教民,设法招回,仍令各安本业。他们对战后直隶各地区秩序的稳定和家园的重建起了很大作用。其次,保护义和团民,维护一方安宁。有的地方的教民抓获了义和拳民,交与洋人欲杀之,有士绅“代求宽恕,遂不果杀”。甚至有的士绅将义和团改为民团,以此来保护义和团。他们的行动虽削弱了义和团的力量,但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了义和团民。还有一些士绅“备犒军各物,诣军前求保护,竟未骚扰。”<sup>[38](P179)</sup>在昌黎县,“士绅邀张联选充翻译,出为接洽,仅昌黎城厢未遭蹂躏。”<sup>[39](P980)</sup>更有有的士绅甘冒生命危险,以承担罚款的方式来保护乡民,新城县的拔贡生陈楚香冒险独往联军驻地,认纳罚金千两,联军始撤。青县的两位士绅代表为了“到天津来筹款向联军赎回他们的县城”,结果在途中被德军枪决了。<sup>[40](P92)</sup>他们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虽不可取,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毕竟维护了一方平安,使群众免遭涂炭。

### (二)高举大旗,继续反抗斗争

八国联军的侵略暴行,清政府的卖国求荣,给直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面对此浩劫,有少数士绅基于民族大义,奋不顾身,继续同侵略者和清政府进行着斗争。其斗争方式,一是以和平的方式,据理力争。有一士绅在上李鸿章书中认为,“保府一带拳匪肇祸,概由于教民横行讹索所致”,并指出庚子赔款的不公平,言语恳切,发人深思。<sup>[41](P137-138)</sup>徐水县南百塔村,联军借查义和团为名,欲搜掠全村。绅士范春霆“正言厉色,拼死力辩真诬”,全村人终得幸免。在固安县,义和团运动进入低潮后,法国天主教徒李宝瑞仰仗帝国主义势力胡作非为,人民敢怒不敢言。该县“拔贡生李芳园将其诱至家中,夺其枪械,并将其同党十余人捆送县署。”此后三纵三擒,才将该匪正法。<sup>[42](P941)</sup>有地方的士绅还采取了以洋制洋的办法,故城县的曹洋田等苦于天主教的势力和各种罚款,由县城引来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来抵制天主教势力。<sup>[43](P139)</sup>这些士绅虽未真刀真枪地同侵略者及反动教民作战,但他们正义凛然,不畏强暴,敢于据理力争的精神也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二是以武力抗争,并带有反清色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沧州南桑园开明绅董备战一事。联军犯沧州,桑园绅董集合团练2千余人,加以训练,并准备了一些洋枪、洋炮。联军逼近沧州时,绅董令“闭寨固守,犯则击之。”<sup>[44](P108)</sup>他们的行动,震撼了敌胆。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提出了“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表明直隶士绅在庚子之变后,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清政府反动卖国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丑恶嘴脸,领导和参加这些起义的士绅,尽管居少数,但他们自觉地将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把义和团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三)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义和团

随着中外战局的变化和清政府态度的转变,这类士绅凶相毕露,联合侵略军、清军共同镇压义和团。房山县县令会同士绅“禀请法兵百名来房驻扎七月之久,一切支应浮费,俱由地方官与该绅等筹办供给,一无所缺。”<sup>[46](P68)</sup>有的士绅为了讨好侵略军,不仅供应吃喝,还抓捕拳民送与洋人当功。其无耻行径,昭然可鉴。更有甚者,有的士绅充当了民族败类,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天津义和团被镇压后,八国联军成立了军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都统衙门,将天津分成五个管理区,其成员大部分为士绅。大直沽的士绅还“禀请派来洋巡捕十人”,帮助维持治安,以“保护有产者利益。”<sup>[47](P524)</sup>此外,庆云县的安抚局、沧县、密云的支应局等,都带有类似的性质。这类士绅在对待赔款问题上,大都卑躬屈膝,对帝国主义有求必应,献县的一些士绅成立公议局,“酌议抚恤之条,赔偿烧毁房屋、器

皿、什物等件。”<sup>[48](P454)</sup>正如诗中所云:“官绅列队出迎辉(易州东门名),手举降旗跪路埃。士子未羞亡国恨,却‘谈拳乱惹洋灾’!”<sup>[49](P116)</sup>正是对这些民族败类的生动写照。

那么,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士绅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什么会有新的分化呢?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八国联军的节节推进与清政府态度的转变。清廷宣战后,形式上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保持一致,并推动其走向高潮。但清廷进行招抚只是为了利用义和团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支持义和团反帝爱国。居于天子脚下的直隶士绅并不能洞察其真象,出于种种愿望,一涌而上。当清廷看到招抚之后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及八国联军的节节进逼时,于9月14日正式撕下诺言,把八国联军入侵无耻地说是“祸端肇自拳匪”,要剿灭义和团。新的形势,使绝大多数士绅感到大祸临头,所以顺水推舟,以旁观者的身份静观势态的发展。第二,义和团“神术”的失灵。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时,关于义和团神术的传说,能起到团结、凝聚力量的作用,“以致声势汹汹,闻者为之恐惧”。但是,近代的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训练有素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靠念几句咒语就能打倒的,义和团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尽管他们英勇无畏,但在近代军事科技面前还是打了败仗,如此情形,不能不失人心。加之一些地方的过火行为,更是给义和团蒙上阴影,如时人所论:“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失灵;如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sup>[50](P15)</sup>甚至出现了团民因“伤亡既众,多不服且骂其师无术,徒伤人命”的情况。<sup>[51](P153)</sup>这就大大影响了义和团的威信,很多士绅见大势已去,不能不转变态度。

第三,根本原因是由其社会地位及思想局限造成的。他们受过正统的儒家道统教育,有功名、地位,为一方人民所敬仰。因此在局势危机时,他们不可能象广大劳动人民斗争那样坚决,而是心事多、包袱重,瞻前顾后,产生分化是必然的。

总之,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他们没有能很好地借助义和团运动——这股革命洪流来肩负起历史变革的使命。“民间宗教并不是农民阶级天然可以利用的工具,民间宗教并不等于农民革命运动。”<sup>[52](P174)</sup>这中间需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精英审时度势,对运动时期的松散、感性的东西加以提炼、升华,提出一套符合人心的纲领、口号。义和团运动没有能造就出这样的精英来统一人心,凝聚力量。它的区域性、分散性、靠揭帖聚合的特点,恰恰说明了缺少士绅精英。但是,义和团

运动毕竟使直隶士绅受到亘古未有的冲击,迫使其放弃一些旧的观念,振刷士气,为其在20世纪初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

### [参考文献]

- [1] 吴宪.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2010(1): 48.
- [2] [3][4][6][20]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四)[Z].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1.
- [5] [50] 仲芳氏. 庚子纪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7] [8][11][38] 北京大学历史系.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9] [14][44][47][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史料(上)[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10] [17] 吴永口述. 庚子西狩丛谈[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2] [24][25][41][43][46]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3] [3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5] [31]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三)[Z].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1.
- [16]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一)[Z].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1.
- [18] [33][36][37][51]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二)[Z].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1.
- [19] 威廉·斯通. 政治心理学[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21] 中国历史研究社. 庚子国变记[Z]. 上海: 上海书店, 1982.
- [22] 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J]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 1980, (1): 46.
- [23] 盐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盐山文史资料[Z]. 盐山: 盐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26] 王广远. 义和团廊坊大捷[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 [27] 本表系根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史料、义和团(1-4册)、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盐山文史资料、易州庚子拾零、义和团廊坊大捷、义和团在河北等有关资料搜集整理而列出.
- [28] [32][49] 马永祥. 易州庚子拾零[M]. 保定: 河北大学历史系油印, 1982.
- [29] [35][39][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史料(下)[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4] 路遥主编. 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 [4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5] 徐绪典.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Z]. 济南: 齐鲁书社, 1991.
- [52] 汤一介. 中国宗教: 过去与现在[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The research on the Zhili gen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Boxer Movement

WU Xian

(College of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Zhili is not only the cradle of the Boxer Movement, but also the center of the movement. The Boxer Movement always 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en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the gentry participates the Boxer Movement, their reactions in the early and climax phases, and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reasons for diversion in the later phase of the movemen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Yihe gentry should be taken as a progressive for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Boxer Movement.

**Key words:** Zhili gentry; consitution; traits; mind set